

# 新密“农民书法村”寻求突围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青文/图

**核心提示**  
扛起锄头是农民,拿起毛笔是书法家。这是记者在新密市城关镇楚沟村采访时见到的一个奇特现象。这个地处丘陵山区的小村庄,人口不多,却有省、市书法协会会员49人,书法爱好者200多人。村民参加各类书法比赛屡获大奖。至今,该村获国家级大奖就有30多个。因受书法影响,该村还被郑州市书法家协会命名为“农民书法村”和“特色文化村”。  
如今,楚沟村上至耄耋老人,下至未入学的孩童都能提笔挥毫泼墨,写下一幅幅令人惊叹的书法作品。然而,在当今经济时代,楚沟村书法如何能像商丘民权画虎村和中国牡丹画第一村洛阳平乐农民牡丹画一样注入经济元素,跳入市场呢?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 “文武双全”的新农民

柔和的阳光洒在一排排整齐的楼房上,红墙青瓦掩映在葱茏的树木之中,几位老人在绿荫下唠着家常,这是一个极平常的村落。  
他们时而欢声笑语,时而为坚持自己的意见争执得面红耳赤。原来他们是在交流书法,类似的场景在这个小村庄上,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过上小康生活的新密市城关镇楚沟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步入辉煌时期,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渐走上了工业化之路。  
他们不仅外部环境改善了,物质生活也提升了很多,村民们的精神生活也在日益丰富。自从开展新农村建设以来,楚沟村的村民们不

断追求精神文明建设,他们利用村里书法爱好者多、文化底蕴深厚的特点,修建了500平方米的“书画基地”,建立了书画协会,会员达到200多人,并定期举办书画展。  
日益兴起的书法热、不断提升的知名度,让楚沟村逐渐被人所关注起来。有关部门先后把该村命名为“河南省特色文化村”、“郑州市书法村”、“新密市农民书画基地”。  
楚沟村村委会主任尚银州出资60余万元为村里修建了2000多平方米的“文化大院”,内设图书室、歌舞厅、科普培训馆、文体活动室等学习娱乐场所,抽出专人管理,一年365天全天候开放。楚沟村有喜爱书法绘画的传统,为给大家提供更好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的平台,尚银州2002年又拿出20多万元在村里建起了“书画基地”。目前,只有2052人的楚沟村,省、市书法协会会员就有200多人,村民参加各类书画比赛,获国家级金奖30多个。该村还在每年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举办书画大赛。  
同时,新密市城关镇妇联积极发挥作用,每年给该村开展妇女培训活动6次,提高农村妇女文化水平。在全镇积极开展“敬老好儿女”评选活动,涌现了一大批敬老爱老的先进典型,在全镇营造了良好的敬老风气。  
楚沟村村支书张宗海对记者说:“伴随着农村文化建设的多样化,休闲娱乐、舞文弄墨不单纯是城里人的生活,新农村的农民也要‘能文能武’。”

## 一个祖孙三代的书法家庭

一座四合院坐落在楚沟村马路的右侧,门上挂着“卫生所”三个大字,这就是张中信的家。今年63岁的他是一名中医,不仅精通中医而且对书法也颇有研究,并在2004年加入河南省书协,成为会员。  
张中信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书法,在很小的时候家里贫穷,只能用水在石板上练字,有时候去地里干活,歇脚的时候,把土地磨平,用树棍在地上写字,不仅可以练字还可以缓解劳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房子宽裕,他专门布置了一间书画室,留作和朋友交流学习书法用。  
走进张中信的书法室,迎面扑来一股墨香,使人心旷神怡。墙上挂满了字画,淡淡墨香让人不由自主地细细端详。这些字有的笔走龙蛇、有的遒劲有力、还有的笔酣墨饱。看上去显然出自多人之手,记者好奇地询问,得知全部作品都是出自全家成员之手。



农民书法家练起书法一丝不苟

受张中信老人的熏陶,他的儿子张世录也自幼练习书法,所写的书法独成一派。通过多年的不断努力,张世录在2007年被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一个平凡的农村家庭,出了两个省书协会员,这可谓不多见。  
在书法的熏陶和潜移默化中,现在正读高中的张世录的女儿,也练习书法,并且经常在比赛中获奖。在记者采访时张中信老人说:“我并没有强制让孙女一定要练习书法,可他们看我写得多了,也喜欢上了这门书法艺术,其实俺村的书法传统基本上都是这样延续下来的。我还参加过几次国家级的书法比赛,曾经获得过‘全国书法大赛金奖’,并且被中国书画研究院吸收为会员、被河南省书画研究院聘任为研究员。没想到练书法会获得这么多荣誉,这是国家对我水平的认可啊。”说起获奖的经历,张中信流露出很大的自豪感。  
提到将来的目标,张中信非常肯定地说:“培养更多的书法人才,让楚沟村的书法走向全国。”  
类似张中信老人这样的家庭在楚沟村还有很多,他们以书法为媒介交流感情,并且在书法中寻求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记者又来到张成勋老人家,今年已经77岁的张成勋,看上去依然精神焕发,他自小跟随父亲和兄长学习书法,现在还坚持每天在一块

石板上练习。他说:“俺写字不为出名,不为牟利,就为自己高兴。干活干累了,写上它几笔就觉得轻松多了,遇到啥烦心的事,写上几个字,也会觉得舒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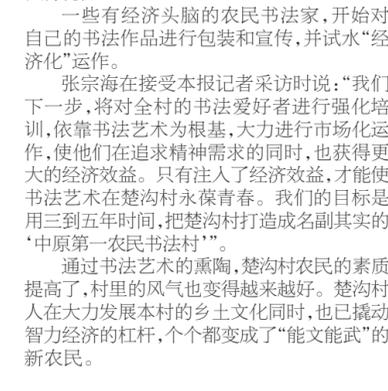
## 因书法而改变的村庄

张宗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为了能够满足村民对书法爱好的需要,村里成立了书画协会,办起了书法展厅和家庭书法展,每年还举办两次书法比赛,农闲时节邀请专家来授课,举办交流会,提高村民的书画创作水平。过去,农民把地里的农活干完后,喜欢打牌、赌博、吵嘴、斗殴,自从办书法比赛以来,农民的素质提高了,村里的风气也好了。”  
随后记者来到村民张海池家,进入院内给人一种舒心的感觉,一株株精心修剪的树木十分别致,十几盆优雅的盆景和精致的菜园浑然一体。在他那间不大的练字房里,墙上几幅字画散发出淡淡墨香。他对记者说:“写字是一种享受。”  
张海池把书法当成了一种享受,而更多和他一样爱好书法的村民也从中学找到了乐趣。他们洗去腿上的泥巴,伏案挥毫泼墨那种忘情的姿态让人难以想象他们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农民。  
浓厚的墨香吸引着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书法艺术之中。该村也被命名为“农民书法村”、“特色文化村”。  
新密市文联主席张延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楚沟村的这种现象充分表明了群众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更渴望精神方面的追求。这种好现象也使得很多村民得到了益处,但是如何寻找到一个永葆青春活力的路径,这是楚沟村目前应该做的一个重要事情。”

## “农民书法村”的突围

这个蕴含书法艺术的村庄,随着书法爱好者的增加,逐渐形成了一种品牌。  
然而,在当今经济时代,楚沟村书法如何能像商丘民权画虎村和中国牡丹画第一村洛阳平乐农民牡丹画一样注入经济元素,跳入市场呢?这成了他们思考的一个最重要问题。  
就在他们围绕这个问题争论时,郑州市委宣传部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到了楚沟村。工作队不仅从物质文明抓起,而且还抓紧了精神文明建设。他们鼓励、扶持农民开展书法创作。并且帮村里成立了书画协会,办起了书法展厅,每年定时举办书法比赛,农闲时节邀请

专家来授课,举办笔友会,提高村民的书画创作水平。通过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大力帮扶,现在书法创作已成为楚沟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亮点和特色。  
为更好地推出这一靓丽的文化名片,将楚沟村推向郑州乃至全省,2009年国庆节前夕,在工作队的创意策划下,楚沟村在郑州市文化馆举办了农民书法展。作为郑州市国庆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书法展共征集了农民书法作品200余幅。作品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丰硕成果,和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崭新风貌,为共和国六十岁生日献上了一份独特礼物。  
一些有经济头脑的农民书法家,开始对自己的书法作品进行包装和宣传,并试水“经济化”运作。  
张宗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下一步,将对全村的书法爱好者进行强化培训,依靠书法艺术为根基,大力进行市场化运作,使他们在追求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只有注入了经济效益,才能使书法艺术在楚沟村永葆青春。我们的目标是用三到五年时间,把楚沟村打造成名副其实的‘中原第一农民书法村’。”  
通过书法艺术的熏陶,楚沟村民的素质提高了,村里的风气也变得越来越好。楚沟村民在大力发展本村的乡土文化同时,也已撬动智力经济的杠杆,个个都变成了“能文能武”的新农民。



张中信通过书法艺术的发展获得了众多荣誉



因书法而闻名的农民被新密市评为领军人才

# 新闻时评

## 领导干部应一级做给一级看

“实干是真功夫,落实是真本事。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而不能只是一级说给一级听。”福建省委书记孙春兰近日在干部大会上的一番话,引起大家的共鸣。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至关重要。上行下效,必要的“说”自有其意义和价值,但更应该办实事、求实效,用实实在在的工作进展来说话。  
在一些地方,有的同志擅长坐而论道,热衷于说空话、假话、套话、大话,豪言壮语多,实际行动少。“一级说给一级听”,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表面上层层都在讲落实,实际上是层层没落实;表面上风风光光、轰轰烈烈,实则脱离实际、劳民伤财。在“一级说给一级听”的喧闹中,发展机遇失之交臂。  
“喊破嗓子,不如干出样子。”喊,是一种宣传,是为了尽快让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干”,要的是过程和结果,是将各种想法付诸实践。在现实中,有些干部之所以“喊”代“干”,是因为“喊”起来容易,“干”起来难。“喊”只要动嗓子、开开大会,就能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可是“干”要到工作一线、生产一线,要甩开膀子、放下身段。  
“喊”的“好处”还不止于此。有的人习惯“喊”,喜欢“喊”,还因为“喊”能推卸责任。有些领导干部在工作中拈轻怕重、挑三拣四,出头露脸的事自己干,出了问题别人担。一旦下面的工作没有做好,或者出现漏洞、出了事故,就以下面执行能力低、贯彻不彻底作借口、当挡箭牌。久而久之,干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就可能变成“油水关系”,领导者就会彻底失去群众的信任。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任务艰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打好转型升级攻坚战、持久战,迫切需要各级领导干部真抓实干,一级做给一级看,而不是停留在“一级说给一级听”的层面。如果“只闻雷声,不见雨点”,何谈转型,何谈发展?  
“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领导干部来说,为官一任,就应该带领干部群众一方、稳定一方、造福一方,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成绩。杜绝“光说不干”、“重说轻干”现象,要建立健全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的制度,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让那些身先士卒、埋头苦干的干部有奔头、有干劲,让那些“只说不干”的“讨巧干部”没有市场、没有“用武之地”。“一级做给一级看”蔚然成风,何愁我们的事业不会大跨越、大发展? 段金柱

## 去年高考发生的重庆状元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引起全国舆论哗然。近日,教育部发布今年高考招生规定,与往年办法相比,特别增加了在报名提供材料时要签订诚信承诺书的内容。考生在申请报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时,须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本人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客观、真实、准确,承诺参加招生考试时遵守有关管理规定。《京华时报》3月29日)

今年高考即将到来,教育部推出这一举措的良苦用心不言而喻。笔者注意到,这样的做法,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一些质疑之声:签了诚信书就一定“诚信”了?太过形式主义了吧?  
毫无疑问,签订了诚信承诺书,未必一定会遵守高考诚信,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就像很多贪官在犯罪之前都公开承诺过“廉洁奉公”一样,纸面上或者口头上的“承诺”并不可靠。但不可靠归不可靠,却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了“承诺”存在的价值——在很多时候,签订诚信承诺书、廉政

## 高考时签“诚信书”是不是太晚

言之类,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教育的载体,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引导”和“塑造”,在我看来,这样的形式有比没有好。可以进一步强化考生心里的诚信之弦,我相信,大部分考生会遵守自己的承诺。  
若考生受教育,则形式有意义,问题就怕“流于形式”。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不可能一签了之,教育管理者肯定要对诚信承诺进行基本的审核,势必要经过好几道工作程序,这样肯定会抬高高考管理成本——那么,在现实的操作中,就很容易因为“嫌麻烦”而流于形式。所以,我就觉得,高考时再签“诚信书”——这样大面积推行的诚信教育来得太晚了一些。  
“言行当至诚,立世信为基。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是古代文人留下的传世名篇,也是现代公民所应该遵从的诚信守则。诚信是一种品德,也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

## 程。英国作家萨克雷说过,播种行为可以收获习惯,可以收获性格;播种性格,可以收获命运。对于教育者来说,诚信教育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播种”,要从低端教育开始,而不能到了高考时再想起诚信教育。言传身教,利用各种载体教育引导,使学生去感受诚信、学习诚信和自觉坚守诚信,使孩子们从校园里获得一张人生的通行证——诚信。这是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如果在小学到中学的十几年教育期间,多让学生签几份“诚信承诺书”,高考时就不必再“多此一举”。

还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正人先要正己,教育管理者要穷尽一切努力,消弭因为管理责任缺失和教育腐败行为而导致的“不公正”,诚信教育才不会是一句空话。就像去年高考发生的重庆状元民族身份造假事件,其间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不仅是“考生不诚信”——如果教育管理做不到公平公正,让学生签订多少份诚信书都无济于事。 陈一舟

## 别让“学奴”在期待中慢慢变老

前天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二轮征求意见阶段的最后一天,截至前日下午,教育部征求意见平台上共有近18000条意见和建议,其中学前教育方面的建议最多,高达近4000条。网友最大的希望是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最大的意见是学前教育费用太高。有网友感叹,目前读幼儿园的家长主要是“70后”和“80后”,孩子学费太贵,家长既当“房奴”又当“学奴”。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陈小雅给予了回应:政府要加强财政对学前教育的基本投入。《京华时报》3月29日)  
政府加强对学前教育的基本投入显然很重要,但是,在没有加强投入之前,并不意味着教育部对幼儿园高收费就可以毫无办法,“学奴”们就该坐等政府的资金到位。也不意味着只要政府加强了投入,高收费就变成了低收费,“学奴”现象便从此绝迹。正如天不下雨地上会湿,地上湿不一定意味着天会下雨,还可能存在人为泼湿的情况,幼儿园高收费有没有人为涨价的因素呢?有没有政府投入已经足够了,但仍然在高收费的情况呢?答案是肯定的。  
有资料表明,2008年石家庄大部分幼儿园收费高达5000元以上,2006年广州某幼儿园“捐资助学”费用标准是日托8000元,全托10000元。如此高昂的学费,让一些家长感慨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西安某幼儿园甚至出奇招,教认一个字要收五毛钱,这种做法赤裸裸地散发出一股铜臭味。如果说,幼儿园收取高额费用都投入到幼儿园的建设之中,那倒也罢了,可有些幼儿园的面貌年年都是一个样子,有些公办幼儿园从办学伊始,基础设施就已经很完善了,并不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可为何还要收取高额费用?公办幼儿园收取的这些高额费用,到底用在哪里了,这似乎一直是个谜。  
从整体看,投入不足固然是事实,但同样存在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些公办幼儿园不仅享受了政府充足的投入,而且还有“兴趣班”、“学习班”等创收项目。这些幼儿园,并不缺乏资金,缺乏的只是对收费规范的尊重和幼教事业的正确认识。  
由此可知,要解放“学奴”,教育部不必把希望只寄托于财政的投入,只要有决心有改革勇气,立刻着手出台措施打击幼儿园乱收费,完全可以遏制住幼儿园高收费的势头。财政对教育的投入确实应该加强,但投入不足不应该是一个万能借口,也不应该成为幼儿园乱收费的遮羞布。投入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很多领域都存在,但也有很多领域的收费并没有因为投入不足而肆意而为。如果总是把问题归结于投入不足,却对其他问题视而不见,那么,百姓有可能在这种等待之中,当“学奴”一直到老,也许,当孙子辈的孩子们也进了幼儿园,高收费的问题依然存在。 欧木华



##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27日在研讨会上指出,人们解决纠纷“信访不信法”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他建议领导在重视信访工作的同时减少批示,将各类争议逐步引导到法治的主渠道上来。(3月28日《广州日报》)

信访和信法其实并不矛盾,信访其实就是信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信访是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一种途径”。人们愿意通过信访来解决纠纷是一种正常的权利表达方式。  
诚然,现在确有一些百姓不愿意通过司

## 政府官员信权不信法值得反思

法途径解决问题,但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对法律不信任,不如说是对当地法官不信任。很多上访者是因为明显遭遇“司法不公”,他们上访的目的并非希望领导批个条子让自己赢得官司,而是希望通过这种途径扫除程序正义的障碍,让案子进入重新受理的正常渠道。换言之,信访的最终落脚点还是希望纠纷得到合法解决。  
实际上基本上不存在领导直接批示应赔偿某访民多少款项的例子,领导的批示一般是请某某同志按规定办理,这本就是信访受

## 偏科

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27日在北京举行的2010年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说,2009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所占比例已达15.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工业制造国。但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多数企业尚处于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底部。据统计,美国服务型制造业占所有制造业企业的58%,而中国只有2.2%。中国企业应顺应制造业发展趋势,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从简单加工向自主研发、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延伸,创新商业模式,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 焦海洋 图

理的正常程序,并非“人治”。  
我们应该反思的不是百姓“信访不信法”的伪问题,而是为什么当上级领导批示后,有些部门和官员才会重视解决百姓的问题?这种“信权不信法”的作风才是真问题。如果说领导批条子有什么弊端,也只能说弊端的根源在于某些干部把领导批示的事情放在心上,却把百姓的事抛诸脑后。  
那么,真正解决方案是什么?不能是“干部有疾,信访吃药”,信访是推动纠纷进入正常合法途径的渠道。问题在于,一些干部不愿真心为老百姓办事,却又受不到问责。 欧文